

学术顾问：季羨林

总主编：冯天瑜

林 干

本册主编：林超民

安徽教育出版社

北京教育出版社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山西教育出版社

滇云文化

中华地域文化大系



中國地理文化大系

滇文化

總編輯：王德勝
副總編輯：王德勝
主編：王德勝
副主編：王德勝
編輯：王德勝
審校：王德勝
校對：王德勝
設計：王德勝
印刷：王德勝





中华地域文化大系

滇云文化

学术顾问：季羨林

总主编：冯天瑜

林 干

本册主编：林超民

安徽教育出版社

北京教育出版社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滇云文化/林超民等著.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3.12
(中华地域文化大系)

ISBN 7-5311-5244-4

I. 滇… II. 林… III. 文化—研究—云南省 IV. G127.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4683 号

中华地域文化大系·滇云文化

ZHONGHUA DIYU WENHUA DAXI · DIANYUN WENHUA

学术顾问: 季羨林

总 主 编: 冯天瑜 林 干

本册主编: 林超民

安徽教育出版社

北京教育出版社

河北教育出版社 联合出版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山西教育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西护城河巷 30 号)

邮政编码: 010010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冶金大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16 开本 48 印张 726 000 字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11-5244-4 / C·4765

定价: 105.00 元



总 序

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创造总和的文化，因时间向度的演进而具有时代性，又因空间向度的展开而具有地域性。人们把研讨文化时代性演进的学科称之文化史学，把研讨文化空间性分布的学科称之文化地理学，这两门学科都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独立发展的历史。然而，时间和空间又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两种密不可分的存在形式，时代性与地域性当然也是文化的两种相互依存的属性，我们只有全面观照这两种属性，并考察其互动关系，方能实在地把握人类创造的文化的纵深度和广阔度。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学与地理学的联姻势在必行，而本书系便是文化史学与文化地理学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是一个文明传统悠久深厚的国度，又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度，其文化的时代性演进和地域性展开均呈现婀娜多姿的状态，因而切忌作简单化的描述与概括。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指出：“把中国文化看成一种亘古不变且广被于全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而忽视了中国文化既有时代差异，又有其他地域差异，这对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当然极为不利。”^①谭先生的这一论说显然是有感而发的，因为，笼统地界定中国文化，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作法，此类作法有碍于人们从共相与殊相辩证统一的高度把握中国文化，不利于开掘中国文化无比丰厚的内蕴。

要想获得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必须纠正空泛、粗疏的学风，多做具体分析和实证研究，方能为综合与抽象提供坚实的基

^① 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域差异》，《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础。而此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对中国文化加以分区考析。应当说，在这方面我们有着宏富的遗产。

中华先民很早便在东亚大陆建立起幅员辽阔的国家，并对这片国土的自然风貌和人文状态作过真切的分区把握。成文于周秦之际的《禹贡》简练而准确地描述当时的国土——“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对纵横于东亚大陆的广袤国土，《禹贡》分作“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并对每州的土壤作出分类和等级划分。而土壤分类和等级划分，实际上是对农耕文明国度作经济、文化水平的地区等级判定。此后，西汉史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当时南北东西各地的物产和人文特色有传神的描绘。西汉末年学者刘向则将汉朝全境划分为若干区域，丞相张禹又令僚属朱赣按区域介绍风俗。东汉史家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集上述之大成，对当时的中国作出如下“域分”：秦地、周地、韩地、赵地、燕地、齐地、鲁地、宋地、魏地、楚地、吴地、粤地，并记录各地风俗，绘制出文化地域特征的生动画卷。以《汉书》为端绪，历代正史皆设地理志，以各朝疆域为范围，以政区建制为纲目，分条记述山川、物产、风俗，形成文化区域研究的良好传统，奠定了我们今日理当深入开展的文化区域研究的前进基地。

地域研究涉及到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文化区”。作为文化的空间分类，文化区由自然、社会、人文三重因素所决定，三者 in 历史进程中综合成某种地域性文化特色，如北方的中原文化，雄浑如触砥柱而下的黄河；南方的楚文化，清奇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有人曾这样概括南北文化的卓异处：“北峻南嬾，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儻南华。”这种关于区域文化特征的把握，既着眼于自然环境之分，更观照了社会生活、人文传统之别，当然，文化区并非静态、凝固的空间存在，而是因时演变的。一般而言，构成文化区的自然因素变化较慢，社会、人文因素迁衍较快。明清之际，哲人王夫之在论及文化中心转移的态势时说：“三代以上，淑气聚于北，而南为蛮夷。汉高祖起于丰、沛，因楚以定天下，而天气



南移。”^① 夫之常用“天气南移”、“地气南徙”诸说法，而他所谓的“天气”、“地气”，显然并非专指自然之气，而是自然、社会、人文的综合，更多地包蕴社会、人文因素。事实上，自从具有理性的人类介入，造成文化世界，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变化往往不再是单纯的自然运动，即以各地土壤肥瘠的变迁而论，便深深打上人类活动印记。曾被《禹贡》（反映周秦之际状况）列为下中、下下的长江流域，至近古已成上上之地，如宋人王应麟说：“今之沃壤，莫如吴越闽蜀。”^② 至于各地风俗、学术的异动，更是古今起伏，时有更迭。这是在作区域研究时应予注意的。

当下我们所作的区域文化研究，在观照历史的前提下，更要着眼当下。今日中国，北起漠河，南达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西起“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东极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对领土面积约与整个欧洲相当，包括 56 个民族的中国作合理的文化域分，是本书系的使命。鉴于中国领地的辽阔和文化类型的复杂，有必要作多级次的文化域分。

按照自然条件和经济文化类型，中国首先可分作东、西两部。从黑龙江的爱辉到云南的腾冲之间作一连线，东半壁是向太平洋倾斜的低度高原、丘陵和平原，季风气候使之干湿交替、季节分明，数千年来形成发达的农耕经济、繁富的典章制度和精深的艺文哲思；西半壁以草原、沙漠、高山、高寒高原为主，属大陆干旱性气候，自古以来繁衍着粗犷奔放，富于流动性和生命活力的游牧文明。东西两大文化区的互动，构成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并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化发展提供了无尽的源泉。

东部农业文化区可分为由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农业文化亚区和西南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农业文化亚区。中原农业文化亚区，自北而南又可分为燕赵文化副区、三晋文化副区、齐鲁文化副区、中州文化副区、荆楚文化副区、吴越文化副区、巴蜀文化副区、安徽文化副区和江西文化副区。中原农业文化亚区向北延展为松辽

^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二。

^② 王应麟：《玉海》卷十七。



文化副区，向南延展为闽台文化副区和岭南文化副区。西南文化亚区又分为滇云文化副区和贵州文化副区。西部游牧文化区可分为蒙新草原——沙漠游牧文化亚区(其内又分作塞北文化副区、甘宁文化副区、西域文化副区)与青藏高原游牧文化亚区。基于这种文化域分，本书系由如下十九卷组成：

《燕赵文化》《三晋文化》《三秦文化》《齐鲁文化》《中州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安徽文化》《江西文化》《松辽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滇云文化》《贵州文化》《塞北文化》《甘宁文化》《西域文化》《青藏文化》

这种划分是否周到，本书系对中华文化的分区描述是否精当，还望读者诸君评析、指教。

冯天瑜

拟于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



前 言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祖国有悠久而深厚的密切联系；云南各族人民和祖国人民一道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文化。1956年发现的元谋人，距今170万年，在“巫山人”被发现之前^①，是中国最早的人类。与元谋人相联系的是，在其前有禄丰“腊玛古猿”，在其后有西畴、丽江、昆明等“智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布全省，所以古人类学家认为云南是人类起源的主要地区之一。剑川海门口、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的古代青铜器更令世人惊讶，赞叹不已。自古及今，云南人文荟萃，英才辈出。随着考古新资料的不断出土，文献新证据的陆续发现，学术研究的日益深入，人们对云南文化不能不刮目相看。

与云南文化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相比，对云南文化的研究显得极不相称。这就难怪人们把云南看做文化落后、文明不昌的“蛮荒之地”。研究、介绍丰富多彩的云南文化，是我们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学人，数年来一起学习云南文化，商量旧学，探求新知，希望能有所发现，有所前进。现在将几度春秋探讨的成果奉献给读者，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评指教，促使我们更深入、更细致、更准确地学习和研究，使我们向理想的目标步步接近。

本书是介绍云南文化的，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先讨论“文化”的定义。“文化”的定义实在是五光十色，以至有学者说，有多少人研究文化就有多少种“文化”的定义。我们不想在此就“文化”定义饶舌，因为这套丛书的总主编已就“文化”定义作了正确的论述。本书基本是按照总主编的“文化”定义来论述云南文化的。读者不必在定义上纠缠，可从本书的论述中了解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学术研究十分重视“定

^① 近年在巫山发现新的猿人化石，定名为“巫山人”，距今约200万年，但尚无定论。



义”，“正名”更是中国学者的传统。说到中国优秀学术传统，应该说中国学者是“名”、“实”并重。名不正则言不顺，在“正名”的同时，更讲究求实与求是。在学术研究中事实比概念更重要。

值得详加讨论的是，我们的书名为何不叫《滇文化》、《云南文化》，而叫《滇云文化》？许多学者问过这个问题。发问包含着质疑：“滇”就是“云”；“云”就是“滇”，何必要“滇云”连用？这就需要我们费点笔墨来谈一谈。

司马迁的《史记》116卷《西南夷列传》是最早记录云南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文献。文中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所说“滇”，为西南夷中一个较大的部落。其活动范围在今滇池周围，即现在的昆明市^①及玉溪市、曲靖市的部分地区。“滇人”生活的区域逐渐称为“滇地”，滇地最大的湖泊称为“滇池”。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今云南设置益州郡，统辖24个县。在今晋宁县设“滇池县”，为益州郡的郡治所在地。后来，滇就逐渐成为云南的简称。到明代，以“滇”称云南已成习惯。有《滇史》、《滇志》、《滇考》、《滇系》等著作。

云南最初是公元前109年设益州郡时的一个县的名称。其地在今祥云县、宾川县。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以云南县为中心设云南郡，统辖叶榆（大理市）、遂久（丽江）、青蛉（永仁）、弄栋（大姚、姚安）、邪龙（云龙、漾濞）。唐代初期，在洱海地区形成众多的酋邦，较大的有六个，称为“六诏”。最南的蒙舍诏称“南诏”。在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并灭另外五诏，初步统一洱海地区。唐朝立即封完成统一的南诏王皮罗阁为“云南王”。“天宝战争”后，唐朝退出云南，南诏迅速将统治区域从洱海地区扩展到比今天云南省还大的范围。云南一名的含义也随之从洱海区域扩大为今云南地区。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唐朝与南诏再次结盟。唐朝设云南安抚使司，负责南诏事务。在唐代中期以后，“云南”差不多与“南诏”同义。宋代，“云南”几乎成为“大理”的别称。元代于至元十一

^① 昆明市包括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区、安宁市、晋宁县、嵩明县、宜良县、路南縣、绿劝县、呈贡县。



年（公元1274年）正式设云南行省，从此，云南省的名称逐渐固定下来。自唐代天宝战争后，“云南”地名已逐渐和今天云南省的含义相近，“云”也逐渐成为云南的简称。

两汉设云南县，蜀汉设云南郡统辖洱海地区，因此“云”也时常专指洱海区域，这是狭义的“云”。“滇”在广义上指云南，由于滇一开始就指滇池地区（相当于今昆明市），尽管后来成为云南简称，但在不少时候依然是滇池地区的专称，也可说狭义的“滇”仅指滇池地区。正因为“滇”、“云”有狭义，分别指滇池、洱海区域。所以又以“滇云”来称云南。云南古代文化，主要在滇池地区（滇）和洱海地区（云）孕育、发展、丰富，并向四周辐射，蔓延至整个云南高原，以至周边地区。追根溯源，云南文化大都与滇池、洱海地区的文化有渊源关系。清代学者倪蜕撰著的云南编年史就以“滇云”称云南，书名《滇云历年传》。清人张若骕有《滇云纪略》一书记云南史事与典故。其后，以“滇云”称云南的论著屡见不鲜。20世纪60年代，《云南日报》的主编李孟北先生受邓拓的启发，仿《燕山夜话》在《云南日报》开辟“借古讽今”的专栏：《滇云漫谭》。可见，“滇云”不仅是云南的别称，而且反映了云南发展的历史。在元以前，“滇”多指滇池地区，“云”多指洱海地区。到元代以后，“滇”与“云”才扩大为云南的简称。追溯“滇”、“云”的来历后，也许读者会对我们用“滇云”作书名予以认同。因为“滇云”不仅是云南的“别称”，而且具有更深的文化含义和较多的历史韵味。

云南省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从远古以来，就是祖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从今天的四川成都经云南到印度就有交通往来^①。战国后期，秦国与楚国为统一天下，争夺西南，楚国大将庄蹻率兵入滇。当他要回楚国报告时，“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庄蹻只好返回“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②。汉武帝为断匈奴右臂派使团到“西南夷”地区寻求通西域的道路。不久，以兵威临滇，滇王举国投降。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以滇为中心设益州郡，统领24县。自此云南成为汉王朝的一个郡。汉所设郡

① 见林超民《蜀身毒道考》，《西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1980年第一辑。

② 《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



县，既任命太守、县令、邑长，又任命土长为王、侯、长。汉文化逐渐在云南传播，云南文化给华夏文化增添了新的光彩。

至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以后，王朝势力逐渐衰弱，方土大姓崛起。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设南中七郡，命徭降都督统领。晋泰始六年（公元270年）在南中设宁州，为全国十九州之一。东晋咸和八年（公元333年），晋在南中失败，大姓在南中踞地称雄，历东晋、刘宋、萧齐、萧梁以至北周、隋、初唐，为时四百余年。但与中原的联系，没有断绝。爨氏虽自相承袭，但仍奉南朝正朔。从整体上看，南中文化仍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隋开南中设立州县，初唐更广泛设立府州。天宝战争后，南诏与唐朝决裂。南诏在城门立碑，“论阻绝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①。“阁罗凤尝谓。后嗣悦归皇化，但指太和城碑及表疏旧本，呈示汉使，足以雪吾前过也。”^②南诏多次表明，其“不得已而叛”。“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被吾罪也！”^③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南诏王异牟寻请求归附唐朝时说：“人知礼乐，本唐风化……原竭诚日新，归款天子”^④，“愿归清化，誓为汉臣。”^⑤到咸通元年（公元860年）南诏世隆自称皇帝，与西川争战不休。而在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南诏又请和，屡议和亲。南诏与唐朝的朝贡关系，自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至乾宁四年（公元897年），见于记录约一百次^⑥。南诏首领热切地向唐朝学习经典、礼仪；派遣子弟到唐朝的太学，“使习华风”。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异牟寻归唐后，每年派数十成百的学生到成都和长安学习汉文化。南诏王室与官员“不读非圣之书”^⑦。云南“蔼有华风”，成为“馨香礼乐之域”^⑧。南诏不少文人深通汉文，擅长中国诗赋。南诏统治者主动学习汉文化，积极推广汉文化，使汉文化成为唐代云南文化的主流。

① 樊绰《云南志》卷五。

② 樊绰《云南志》卷三。

③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南诏传》。

④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南诏传》。

⑤ 樊绰《云南志》附录《异牟寻与中国誓文》。

⑥ 方国瑜：《滇史论丛》，10页。

⑦ 《南诏德化碑》。

⑧ 《全唐文》卷八百二十七牛丛《报坦绰树》。



宋代，中原北有大敌，不暇顾及西南，大理仍主动与中原王朝和民众联系。大理国主“累年以来，遣使乞修朝贡”^①。宋朝也曾册封大理首领“云南八国都王”、“云南节度”等。元代初年郭松年的《大理行记》说：“其官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葬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遗风焉。”

蒙古人于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征服大理。元代于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建立云南行省。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元廷“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②。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设云南诸路学校，其教官以蜀士充之”^③。成宗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忽辛任云南行省右丞，“命诸郡邑遍立庙学，选文学之士为之教官，文风大兴”^④。元代先后在云南诸路府州县设学。中华文化在云南得到空前的传播。

明代，由于国家有组织地大规模移民，云南居民由“夷多汉少”变为“汉多夷少”。有明一代，在云南各地建学官六十多所，书院三十多所。白族地区的学校与书院早就星罗棋布，明代在彝族、傣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学校与书院。到明朝末年，云南文化已和中原相差无几。“衣冠礼法，言语习尚，大率类建业。二百年来，熏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人文日渐兴，其地夷夏杂处，然蒸蒸化洽，淳朴易治，庶几所谓一变至道者矣。”^⑤

清代，云南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与之相配合的是立学官，广教习、兴教化。学官从明代的六十余所发展到一百多所。书院广布云南各地。中华传统文化在云南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云南文化自汉代以来，就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云南文化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但作为云南文化主流的一直是中华的传统文化。云南文化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富于民族特色的地方文化；云南文化的发展又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我们在注意到云南

① 《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引《锦里耆旧传》。

② 《元史·选举志》。

③ 《元史本纪》。

④ 《元史·忽辛传》。

⑤ 谢肇淛：《滇略》。



文化丰富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充分注意到云南文化的发展任何时候都没有离开过中华传统文化。云南文化发展的历史自古以来就与中华文化紧密相连。云南文化是在于中原文化相互依存、相互交流中发展起来的。云南文化与中华文化与其说是多元一体，毋宁说是一体多元。

作为中华文化一部分的云南文化，有着鲜明的地方特点。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每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在云南众多的民族中，有不同的社会结构。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有的民族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有多种形式的原始土地制度；有的是家长奴隶制，有的是较为典型的奴隶制；有的是封建农奴制，有的是封建地主制；有的已开始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有的形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云南多种社会结构并存的格局，为我们展现了活生生的人类社会发展史。

自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以来，云南就是多种制度或体制并存的边疆地区。自汉代在今云南设益州郡起，中央王朝就在云南建立“土”、“流”两重统治。汉、晋实行的“边郡制”，唐、宋则实行“羁縻府州制”，元代实行“土官”制，明、清两代实行“土司制”。从明代起，中央王朝就在云南实行“改土归流”，使云南的政治经济体制逐步与中原趋于一致。清代雍正年的改土归流使云南与中原一体化的进程飞速向前跃进了一大步，但统治者的意志毕竟不得不向客观社会与严峻历史低头、让步。他们将改土归流的区域限定在滇池与洱海等社会经济较为发展的“江内区域”，提出“江内宜流不宜土”，“江外宜土不宜流”的限定，继续在云南实行一个省土、流两个体制的办法。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江外的土司制度大体还在延续，呈现多种社会结构并存的局面。

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就是要实现“天下大同”，创建一个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不应互相冲突，而要相互协调。在云南，各民族和平友好地共同相处，大家求同存异，互谅互助、互惠互利、兼容并包，发挥各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在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在向“天下大同”这个中国文化千年求索的伟大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进，并形成了优良的文化传统。

由于各民族社会发展的程度不同，各民族的文化也有显著的差别。傣族、彝族、纳西族等，不仅早就有自己的民族文字，而且有本民族的



天文历法、医药、诗歌、戏剧等方面的文献。多数民族只有民族语言，而没有民族文字，一般采用汉字。采用汉字的民族，多数文化比较先进，如回族、白族、纳西族、满族等。还有一些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民族，则使用刻木或结绳记事。

各民族生活的生态环境不同、社会结构不同，生产的工具与模式不同，服饰、饮食、住屋也千差万别，丰富多彩。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歌曲舞蹈、音乐戏剧更是千姿百态，琳琅满目。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民族众多，文化多元，但“天下一统，华夏一家”是各民族的共识。各民族共同相处，相互依存，相互交流，同心协力，一起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云南文化。云南文化中最本质、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民族团结的兄弟情，心向祖国的凝聚力，维护统一的爱国心。

自汉代以来，中原的汉人和其他民族就以各种方式移民到云南。移民带来中原文化，并在云南创造了既有中原的文化传统，又有云南特色的新文化。到云南征战的将士所写的诗文慷慨悲壮，情深意长，与西北的边塞诗文相类而异趣。游宦至滇的官员的笔下多是云南秀丽的山川，多彩的风俗，纯朴的民情。充军、流放而来的“罪人”免不了有怨气、牢骚，有“看透世态炎凉”的彻悟，有“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①的无可奈何，更有寄情山水，陶醉自然的悠然自得。由于云南宜人的气候，四时不败的鲜花，世外桃源般的田园风光，外地移民很快就适应云南的生产与生活，把云南视为乐土与家乡。对云南充满热爱之情的诗词歌赋也成为云南边疆文化的一大特色。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抗击外来入侵者的英勇斗争，也是云南边疆文化的显著特点。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疆，自汉代起中原王朝主要是通过四川对云南进行管理，如益州刺使部管辖益州郡。晋王朝在云南建立宁州，为全国十九州之一，但仍受四川的影响。唐代主要由剑南道统领，元代建立云南行省，直接由中原王朝统辖，明代，中央从江南等地区大量移民到云南，清代设云贵总督辖云南贵州，而元、明、清三代，云南与四川的联系并未减少。所以，云南在文化上与四川的联系较其他地区更为密切。

^① 此为流放到云南的杨慎所作《西江月》中的最后一句。这首词作为《三国演义》的开篇词而广泛流传。



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云南的古代深受四川文化的影响。

云南北与西藏相接。唐代，吐蕃兴起于康藏高原。唐初，吐蕃南下云南西洱河地区，支持“三浪诏”。天宝年间，吐蕃支持南诏打败唐朝军队，南诏与吐蕃结盟，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给南诏以影响。约半个世纪后，唐朝与南诏于贞元十年（公元794年）重新结盟，共同将吐蕃势力赶出云岭，但是西藏与云南的经济文化联系一直没有中断。藏族生活中不可一日无茶，云南盛产茶叶，普洱茶更是藏民喜爱的饮料，茶叶成了云南与西藏联系的主要媒介，滇藏间的文化交流随着茶叶贸易的展开而日益广泛。滇西北的迪庆藏区，明代曾属丽江府管辖。明末清初受西藏控制，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划归云南省。云南与西藏的经济文化交流通过迪庆而更加频繁密切。藏文化在滇西北的传播，与当地民族文化的交融成为云南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

云南与印度、缅甸、老挝、越南的交往与联系相当密切。云南的特殊地理位置，使云南成为中国文化与西亚文化、东南亚文化的交汇地。外来文化与云南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使云南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绚丽夺目。

作为中国西南边疆的云南，成为中外文化交汇的熔炉。以宗教为例，云南不仅各民族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世界主要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都有传布。佛教，不仅有汉文经典的佛教，也有藏文经典的佛教，还有巴利语经典系佛教。如此众多的宗教汇集在云南已是一个“奇观”。更有趣的是，在世界上不同宗教间的冲突屡见不鲜，而在云南，不同的宗教却能和平共处，相安无事。

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云南文化没有偏狭、钿蔽、排外的倾向，而具有开放、博采、兼容的气度，从而形成云南文化的多源与多元的特色。

20世纪初，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不断展开和深入，文化史研究异军突起。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云南文化的研究也逐步受到注目，前清云南最后一个状元，也是20世纪云南新文化的先进袁嘉谷，最早从事云南文化的研究，其所著《滇绎》等书已涉及云南文化的探讨。袁丕钧的《滇南文化论》可说是第一本论述云南文化的著作。自庄跻开滇至清代的治乱、人物、著作、金石等均有论述。1923年9月，夏光南著《云南文化史》出版。全书分古代史（先秦至两汉）、中古史（唐宋）、



近代史（元明）、近世史（清代、民国初）四篇。每篇分政治和文化两部分。政治记述重大政治事件、边疆政策、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文化方面注重“种族之迁移同化”、学术思想的传播、生活方式的转变等。今天看来，这本书较为单薄、粗糙，且有不妥和失当之处，但其开创之功不可没。

1937年，云南大学成立“中国西南文化研究室”，由方国瑜教授任主任。这是云南文化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云南文化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在方国瑜的主持下，编辑出版《西南边疆》杂志（季刊），出版“西南文化研究丛书”11种。其中徐家瑞的《大理古代文化史》是云南文化史的开创之作。这部书虽然以“大理”为名，由于自唐天宝战争后，以今大理为中心的南诏和宋代的“大理国”统有整个云南。所以，大理古代文化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云南文化史。这部著作经作者修订后，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70年代，香港、台湾的书局曾再版过。

1952年云南大学撤消“西南文化研究室”。之所以要将一个有15年历史和丰硕研究成果的研究室取消，据说是因为有权威人物认为：“文化史观”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被错误理解和片面夸大。文化史观既然是唯心主义的，那么与文化有关的论著和研究也就是“唯心主义”的了。正像“西南文化研究室”成立标志着云南文化研究的兴起一样；“西南文化研究室”被取消也是云南文化研究被迫中断的信号。随着“西南文化研究室”的关闭，云南文化的研究也极少有人问津。

80年代，中国出现了“文化热”。沉寂二十多年的文化研究，猛然“反弹”。与50年代怕言文化相反，高谈“文化”成为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的“时尚”。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也不甘寂寞、不愿落后，出现了文化研究的“复兴”，掀起新的研究高潮，并涌现出一批文化研究的新成果。

80年代中期，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著名民族学家刘尧汉主编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这是第一套专门研究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的丛书，在已出版的近20种著作中，大多数作者是彝族。《中国文明源头新探》、《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等著作中有不少标新立异的观点，提供了不少作者研究的新资料。尽管一些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论，有的学